

福柯对西方权力“戏剧”之维的批判及其理法路径

刘临达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西方关于权力的“戏剧”之维构建有着悠久的历史。福柯通过描述西方精神病院近代以来的相关情形, 揭示和批判了医院对精神病人的“戏剧化治疗”, 包括其内部随意“设置角色和剧本”的危害, 从而开辟了理解现代西方统治术形式的新途径。福柯的批判, 其话语分析蕴含着结构主义方法论要素, 其历史分析则隐含着其与马克思权力论的传承关系。解读福柯对权力戏剧之维的批判, 不仅有助于理解西方许多现代性问题的理论环节, 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应对当代的“霸权剧本”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启发意义, 如如何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书写“美美与共”的崇高性叙事, 如何从命运共同体的维度去书写国际交往的政治美学, 等等。

关键词: 福柯; 权力的戏剧之维; 结构主义; 历史动态; 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 B152

文献标识码: 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1)03-0131-10



一、引言

西方关于权力的“戏剧”之维构建的论说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古希腊时期, 柏拉图在考虑建立其所谓“理想国”时, “整个政治制度就建得相当戏剧化”^{[1](576)}。柏拉图进一步指出: 如果按照其所推崇的斯巴达式“王政”来建立理想国的话, “哲学王”就要自己制定“舞蹈、歌曲、歌舞活动的整个规划”^{[1](559)}。由此, 城邦就能运行在相当戏剧化的古希腊式贵族政体之中。然而, 柏拉图关于权力的戏剧之维的构想, 终其一生也只是停留在文本探讨之中, 并未付诸实践。另外, 尽管古希腊社会曾出现过“观剧津贴”的制度安排来促进戏剧与政治的结合, 但学界一般也没有将其与柏拉图的理论构想联系在一起。

在柏拉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权力戏剧之维的构想并没有再度引起西方学界的理论聚

焦。到了20世纪, 在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学者开启了西方哲学的“话语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之后, 一部分学者出于所谓的“话语研究”的敏感性, 又重新开启了对该问题的探讨。福柯和其老师阿尔都塞对此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在这一时期。

话语研究是微观研究, 所以福柯和阿尔都塞两人都不再以柏拉图式的宏观视野审视和讨论权力与戏剧的问题, 而是从一种微观视角出发, 将论述题材转向了精神病的治疗问题。两人同时将批判的焦点指向了精神病院里的“戏剧化治疗”。阿尔都塞住过医院, 所以对精神病院里医生的“假装治疗”做出了直接且辛辣的批判。阿尔都塞将当时的圣安娜医院称作“基罗尔地狱”, 并且认为, 某些时候精神病医生所谓的治疗只是一种表演, 而不是一种科学行为。这种表演之所以能够继续蒙混下去, 是因为外界对其中的详情并不了解——“不了解医生有时会面临可怕的困难, 有时在突然陷入令人焦虑绝境的同时还得继

收稿日期: 2020-06-13; 修回日期: 2020-11-22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科研启动项目“权力理论在前马克思时代的西方范式”(202044002)

作者简介: 刘临达, 山东威海人, 法学博士,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政治哲学基础理论, 联系邮箱: weilaihengzailai@163.com

续做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2](29)}。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福柯延续了其老师关于欧洲精神病院的相关研究，并重启了对西方权力戏剧性特征的研究。

与阿尔都塞的直接批判不同，福柯笔下的《性经验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规训与惩罚》等作品虽然都只讨论了某个社会问题的某一方面，但每一部作品，都因刻画了西方世界里的某种通用权力技术和批判影射了西方世界相关问题的普遍性而成为经典。以《规训与惩罚》为例，该作品虽然只讨论了欧洲社会的监狱问题，但是其中所描绘的“全景畅视”权力技术，却使欧洲后工业社会的监控问题受到影射。另一部《疯癫与文明》对社会问题批判的广泛性意蕴也与《规训与惩罚》异曲同工：欧洲精神病院对待精神病患者的某些权力技术，是欧洲特定时期某些普遍性权力技术在局部社会延伸和运作的缩影。这种以小见大的书写方式，不仅是福柯文本的一大特点，也是福柯文本相关权力论述的价值所在。以其为学术棱镜，能够帮助后世更好地理解西方近代以来的现代性弊病。

二、福柯对精神病人治疗中医院权力戏剧之维的批判

用戏剧手段治疗精神病人，在西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常规手段。甚至在20世纪早期，当弗洛伊德开创了精神分析理论之时，他也仍然认为戏剧手段是治疗精神病人的常规手段。弗洛伊德认为，普通戏剧、普通心理剧、心理变态剧，这三者对观众产生的影响是有很大区别的。普通人可能会在观看普通戏剧、普通心理剧时产生触动，而在观看心理变态剧时却不明所以；精神病人则会对心理变态剧产生触动。这是因为，普通人只会产生诸如“当英雄”之类角色的代入快感，但精神病人则会有其他的心理冲动，并期待某些特殊角色的代入快感。对于这种剧本，弗洛伊德说：“这里，快乐的前提条件是观众本人须是一个神经症者，因为只有这种人才能够从(心理变态)戏剧的昭示中和从被压抑的冲动的或多或少的

意识中获取快乐，而不是反感。”^{[3]7}所以，弗洛伊德认为，戏剧治疗就是要洞悉并化解某些特殊的心理冲动和角色代入冲动。精神分析的催眠方法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治疗的关键之处在于，治疗者千万不能被神经症者的心理剧本所同化。否则，一旦反向的情况发生，则治疗者就会忘记对方是一个病人。弗洛伊德认为，这些心理变态剧要审慎对待。因为，“看来似乎是剧作家们在诱发观众产生相同的疾患。”^{[3](8)}因此，催眠、心理剧本置换，都显得十分必要。

弗洛伊德的这些观点在福柯的有关论述中遭到了批判。福柯的分析指出，在这种置换心理剧本的过程之中存在一种权力滥用的隐患。通过描述西方精神病院近代以来的相关情形，福柯揭示了其内部随意设置角色和剧本的危害。并且，在“话语研究”的层面来看，西方精神病院本身可能就是一种特定时代话语所编织的“局部剧本”，且对参与者有强制性。精神病院对病人实施的强制性治疗，则是其不受约束权力进一步编织的“剧中剧”。因而，所谓的“病人”一旦接受精神病院的治疗，就很可能再也无法出院。对此，一种对当时状况比较激进的批评也指出“疯癫是社会创造的”^[4]。对于精神病院的种种戏剧化强制，一种观点认为福柯的主要价值在于批判了一种“自导自演”的不受约束的权力。在这种权力架构中，“主管的角色以及他至关重要的组织性表演，将其安置在了一个拥有两重性的地位：既内在地和外在地主导着关于真实的表达，也承担着这种表达对于机构和对于他自己而言的种种结果”^[5]。由此福柯意在启发我们，在治疗精神病人的问题上，首先是要限制精神病院里医生的权力，而不是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优化治疗方案上。

在福柯的“疯癫考古”中，我们还能看到精神病院里荒诞的治疗方案。例如，有的疯人认为自己是死人，因为死人是吃东西的，所以他也不应该吃东西；也有的疯人认为屋子里的人都死了，而自己也在这个屋子里，所以自己也应该是死了的。以当时的科学水平，精神病院治愈上述两类病人的医疗条件并不具备，但由于精神病院

里“医生—病人”角色系统的预设不受任何质疑，精神病院的权力不受任何干预，因此病人只要被送进精神病院，就会被随意治疗。于是我们看到了十分荒诞的治疗场景：医生邀请三五好友装扮成阴间的人物，在疯人的床前进餐，并大谈特谈死人应该吃东西这个主题；疯人院也会常常策划“茶话会”，邀请疯人按照院长和工作人员的暗示来扮演特定的角色。在这些角色扮演中，疯人必须按照被指派角色的预设完成一系列言谈举止。对此，福柯批判说：“疯人不停地扮演着这种名不符实的陌生人的角色。他人的观察、礼节和伪装会无声地强加给他某种社会人格”^{[6](234)}。

福柯认为，对待精神病人的这种戏剧化强制，应视为不合理。因为，这只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很多近代以来的“话语建构”有关。在哲学经历了“话语转向”之后，这些现象都应再予以反思。福柯通过对“话语建构”的历时性考察发现，在精神病院出现之前，疯人是被放置在“人类社会—已知自然—神秘自然”的话语之中来理解的。在这种话语所构造的角色想象之中，人们往往带着惊异的目光，把疯人想象为一种神秘的、强大的自然力量。当时的人们认为，“疯人不是病人。兽性使疯人免于遭受人身上脆弱、不稳定、不健康等因素的伤害。疯癫时的那种顽强的兽性，以及从鲁莽的野兽界借来的愚钝，使疯人能够忍受饥饿、高温、寒冷和疼痛”^{[6](73)}。所以，在那个年代，并不存在对疯人的强制性戏剧治疗。而对于更早期的情况来说，疯人的处境则更加自由。福柯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允许各种无理智自由地展示于光天化日之下”^{[6](67)}。通过这种对比，福柯意在指出：疯人在近代以来的遭遇，是因为一种全新的权力技术向他们扩展，一种新的牢笼式话语系统开始试图规训他们。按福柯的理论，这种希望人人都被改造成类似黑格尔语境里“优美的灵魂”的权力意图，往往是近代西方社会弱势群体命运悲剧的起点。对此，福柯说：“这个灵魂是一种权力解剖学的效应和工具；这个灵魂是肉体的监狱。”^{[7](32)}

通过福柯的“疯癫考古”能够看出，近代西

方的现代化进程是需要反思的。尤其是在对待弱势群体方面，许多做法都值得商榷。对精神病人的戏剧化治疗就是其中的典型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也正是福柯等人创造的学术价值所在——“通过对莎士比亚和福柯的解读，在政治仪式和戏剧性的系谱学方面，开辟了很多理解现代西方统治术形式的新途径”^[8]。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对其中所蕴含的理论核心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解读，特别是福柯是运用什么方法探触到了长期以来并未受到质疑的事物的问题。其分析的方法论，以及其所属的理论传统又是什么。解答这些问题将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分析类似问题的参考。

三、福柯权力戏剧之维批判中的结构主义要素

在经历哲学的“话语转向”之后，不少西方哲学家开始质疑西方的政治话语和真理间的必然联系，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以及詹明信等人更是把西方的政治话语当成世俗权力的技术牢笼。结构主义方法论正是西方哲学“话语转向”潮流中的核心要素。具体地说，就是一部分理论家开始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论，来分析话语的“命名”“赋名”“指位”等能指和所指间看似偶然的对应关系中所包含的权力技术。

世界上众多的语种对物质的命名是千差万别的。从结构主义理论来看，话语的能指和所指的对应，特别是命名，具有很强的随机性。“语言符号是随机的，拟像性是它的典型特征”^[9]。诸如“水”“火”之类的基础性词项，我们在脑中反映的可能是“水”“火”的拟像，但是“水”“火”具体以怎样的能指和所指表达，就是完全随机的。正是由于话语的这种随机性，它才可以成为权力运用的中介。

在近代的西方世界里，话语中的“名”“词”“指称”等要素并不是中性的。这是福柯在其最主要的方法论著作——《词与物》中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繁多的语言符号能够通过体系化与结构化规定来实现某些权力效应。例如，一份来自

中国的分类表曾引起欧洲人发笑,其原因是该分类表把动物分成“皇家的、有芬芳的、驯顺的……”^{[10](1)}。福柯曾认真地思考过当时欧洲人发笑的根源,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欧洲人并不知道该分类表中的相关意象在中国语境中的规定和所指。

结构主义认为,由于话语结构的形成和话语所指一样没有普遍性规律来遵循,它最终也呈现出了千姿百态的共时性结构。任何团体,只要拥有足够强的公共权力,它就能拥有自己的话语结构;如果公共权力崩塌了,与之相关的话语结构就会跟着一起土崩瓦解。福柯也持此观点。福柯进一步将不肯放弃失效话语结构的人称为“异托邦人”。“异托邦人”使用诸多概念之所以会被认为是“奇怪的列举”,是因为“使这种(诸多概念)相遇成为可能的那个共同基础(权力)已经被破坏了。”^{[10](3)}离开了权力,千种千面的共时性结构不一定都能继续存在。

依照福柯的上述理论,可以从结构变迁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疯人问题。具体来说,在没有“医生一病人一家属”这种安置疯人的共时性结构出现之前,疯人的社会处境是完全不一样的。依照当时社会对角色系统的理解和安排,疯人不会遭受悲惨际遇。福柯曾引证《李尔王》《麦克白》《哈姆雷特》等经典戏剧对此进行了前后对比。在这些剧作中,作为公开的、光明正大向社会展示并被广大观众接受的疯癫,是没有完全被列入“他者”维度、没有在话语位置上被“降维”的疯癫。这是福柯通过对比得出的结论。特别是通过“考古”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笔下的疯癫,福柯认为,当时的社会仍然对疯癫保留着足够的社会容忍度,甚至认为疯人潜在地具有说出不为人知的真相的能力。这也说明,在那个时代人们并不急于干预疯癫。但是好景不长,如福柯“疯癫考古”所揭示的那样,随着共时性结构的转换,“疯癫很快就告别了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给它安排的这些终极地位”^{[6](33)}。

在对待疯人的问题上,话语共时性结构的权力效应体现得十分明显。具体来看,有人认为是死人的这种想法,就构成了对当时话语权力

的挑战。因为,在当时欧洲社会所有角色预设系统中,没有“死人”这一说法。相反,大家要尽心尽力地当“活人”,完成诸如为上帝服务,为领主服务等任务。但是疯人坚持要成为自己设定的角色,并常常用看似具有自洽性的“我是死人—死人不吃东西—我也不吃东西”这一形式逻辑来和外界对抗。福柯说:“很轻易地在疯人中发现了这些严格的推理形式……疯人的这种不可思议的逻辑似乎是对逻辑学家的嘲弄,因为两者十分相似,更确切地说,二者完全相同……我们发现了一种隐蔽的完整语言”^{[6](92)}。所以,“治疗”就不能以疯人的逻辑展开。因此,福柯的“疯癫考古”有这样的记载:由于无法说服认为自己是死人的疯人,“医生便承认他的谵妄,让他似乎看到一位手中持剑的白衣‘天使’。这个幻影严厉地训斥了一番,然后宣布他的罪孽得到宽恕。”^{[6](176)}这种“疗法”是为了让“疯人”回到“人间”,回到当时话语权力所建构的共时性结构之中。除此之外,此前提到的“茶话会疗法”在本质上也是想让疯人忘却最初的指涉意愿。很多时候,戏剧性的“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因为在戏剧中,一部分所谓的“疯人”能心领神会医生的意图,从而配合他们演出。但是从福柯的表述来看,他恰恰是在提醒人们,“疯人”之所以能够配合“演出”,是因为“疯人”具有完整的叙事理解能力,所以他才具备表演“治疗性”戏剧的基本素质。

通过以上梳理能够看出,福柯对西方特定时期权力戏剧化特征的刻画,在方法论层面有着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这并不是一种巧合。“疯癫考古”最初是福柯的博士论文,而其写作之时正是列维·施特劳斯将结构主义引入法国并造成巨大影响后不久。对此,我们只需比对一下福柯的有关论述和列维·施特劳斯关于“野性的思维”的相关论述即可看出其中的同构性。

施特劳斯曾批判说,近现代欧洲人始终盲目地认为现代思维是高度理性的、合理的;原始思维是混乱的、无规则的,其分类细致性与结构完整性都有待提高。但是施特劳斯通过细致考察原始思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他认为,原始思维并

不缺乏高度的区分功能，也不缺乏分类的细致性，它始终具有自己独特的共时性话语结构：一种相对于研究者的“先在结构”。原始人已把能指和所指都纳入自己所认可的共时性结构中。施特劳斯把原始人心中固执坚持的这种结构，比喻成修补匠预先在心中谋划的先在设计。施特劳斯说：“修补匠可能永远也完不成其设计，但他总是把与他自身有关的某种东西置入设计之内”^{[11](22)}。原始人的固执还有许多明显的表现。例如，啄木鸟的嘴和治疗牙病并不一定有关系，但是为了补全一种既定的共时性结构，二者就会被纳入一组联系紧密的意义关系之中，“问题并不在于碰啄木鸟的嘴是否真能医治牙病，而是在于是否有一种观念认为啄木鸟的嘴与人的牙齿‘相配’……在于是否能够通过这类事物的组合把某种最初步的秩序引入世界”^{[11](10)}。再比如，孕妇相信怀孕之时遇到的某些意象会和胎儿有某些联系。由此，孕妇便在孕期意象和胎儿之间建立起固执的共时性结构联系，水果、动物等都被拿来参与有关胎儿的相关推理——“如果找到的是鳝鱼或海蛇，孩子将和它们一样柔软和怠惰。如果是一只寄居蟹，孩子就是暴性子的。另外，如果是蜥蜴，孩子就是温柔可爱的”^{[11](73)}。

孕妇臆测式的想象和疯人的某些思维相比没有太大区别，这表明了话语先在共时性结构的巨大效应。原始和文明的对峙、“疯人”和精神病院的对峙，实际上都是话语共时性结构层面对峙的表现。可以说，正是在对语言随机性和结构的强制性的强调中，福柯确实继承了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要素。关于结构主义与权力，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对此也曾直言：“争吵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结构的规律。”^{[2](78)}法国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鲍德里亚也曾借助涂鸦做出分析，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他指出，涂鸦之所以具有反抗意味，是因为涂鸦是对现代资本主义整个意义链条的拒绝。涂鸦纯粹是针对结构来创造的，由此尝试去颠覆资本主义的意义体系——“涂鸦没有内容，没有信息。但这种虚无就是力量，其对形式的全面攻击伴随着内容的衰退，这并非偶然”^{[12](107)}。

通过比对不难发现，福柯“疯癫考古”的结构主义元素是有源可考的。但是，我们却并不能就此认为福柯是在结构主义方法论范围内开展了有关研究。通常而言，学界只认为福柯是一个“唯物主义式的后结构主义者，并与德里达、利奥塔、鲍德里亚等其他后结构主义者有显著的区别”^[13]。这就是说，在理解福柯文本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其与一般结构主义者的区别，尤其是在研究其对某些权力的戏剧性特征的刻画时，这一点更不能忽视。

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不接受结构主义“能知假设”的学者被称为后结构主义者。基于对“能知假设”的不同阐释，后结构主义者们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理论。在福柯的论说中，则主要是借助了结构主义方法论来批判特定的权力。

四、福柯权力戏剧之维的批判与马克思权力观的关联

对于结构主义，福柯说：“结构主义算不上一种新的方法，它只不过是一种现代思维意识，具有觉醒的意蕴，但仍然是成问题的。”^[14]。这种问题主要在于，如果离开了对共时性结构的发生学分析，我们到底在分析什么呢？所以，福柯笔下巨大的历史情境性色彩以及某些意象的前后连贯性，都始终激励着研究者从权力的发生学的角度来理解福柯的理论。这也是福柯在那个时代较为独特的一面。因为，在后结构主义思潮兴起之后，权力的发生学已不再被重视。如鲍德里亚就认为，被压迫者之所以被压迫，是因为接受了一种祛除了“死亡”的能指系统；劳动在西方世界里是一种戏剧动作，在祛除了“死亡”的“剧本”中上演。他认为，这从远古时代就是如此，被处死的战俘和成为劳动者的战俘的区别是，两者接受了两种不同的生存“剧本”。所以，对于今天仍然被迫接受不公正劳动的人来说，“剧本从没变化。劳动的人仍然是那些没被处死的人，那些没得到这一荣誉的人”^{[12](54)}。对此德里达也持同样的观点：人生如“戏”——“技术文明里的个人精确地依赖一种对独特自我的误解而生

存。这种个人是一种角色,或者也可以被称作假面(masque)个人,或人格面具(persona)个人、人物(personage)个人,而不是一个人(person)”^[15]。德里达对人生角色化的批判也是在抛开权力的发生学的前提下展开的。但福柯的理论没有完全抛弃权力的发生学,这在以往关于“疯癫考古”及相关研究之中未得到足够发掘。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之外,福柯关于历史、生产力、暴力、阶级、实践等核心概念的阐述也需要得到重视。这些阐述体现了福柯权力论中某些方面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间的渊源。

“考古”必然包含着发生学的元素。福柯把他的“考古”作品的方法论,称为“知识考古学”。按福柯的解释来看,这种方法论并不意在分析某种给定的、“原初的馈赠”的要素,“而是把它(话语变化)归结于历史实践的过程”^[16]。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福柯对某些戏剧化权力特征的刻画,没有止步于结构主义论域。福柯意在指出,共时性结构的变化根源于实践的改变。实践的改变催生人群的分化,而新崛起的权力主体,在西方世界编织全新的共时性结构。

在描绘规训体制的形成时,福柯认为在西方的“旧制度”下,社会各群体都或多或少地依靠“非法”行为生存。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实践的变迁,新的权力主体开始崛起。由此,旧式君权所编织的共时性结构,开始被资产阶级编织的崭新的共时性结构所置换。这种新的共时性结构表现为近代欧洲的法制体系。由此,西方君权时代对穷人仅存的“慷慨”不复存在,资产阶级苛刻的法律体系开始抹杀对穷人的最后宽容。这也即福柯所谓的西方再也没有了“并行不悖的非法行为”^{[7](307-308)}。禁闭疯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这种苛刻体系的连带效应。除历史实践外,福柯对生产力的重视,也十分引人注目,福柯强调:“权力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得到改变”^{[17](162)}。对这一点,福柯在诸多问题上都做了比较统一的理论归因。如在批判肉体规训时,福柯说,在近代西方的工厂中,工人的生产姿势受到严格规训,目的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按照工业社会的一般规范制造出机械化的个人……这是在制

造机器人,也是在制造无产阶级。”^{[7](272)}对于性问题,福柯指出,西方人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去规范性行为的细节,甚至矫正同性恋的性倾向,是出于保持劳动力人口体量的考虑。福柯指出:“权力技术的最大新变化就是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问题的人口现象……还出现了旨在将夫妻的性行为转化为一种和谐的政治、经济行为的有计划的运动。”^[18]而至于疯人处境的变化,福柯认为经济因素同样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大规模地禁闭疯人,是要最大限度地在西方社会消除想要躲避资本主义劳动的心理^{[6](48)}。

除此之外,福柯关于暴力对“戏剧治疗”的支撑作用,也存在很令人震撼的论述。这主要是通过“考古”“水”这一意象的变迁来揭示。“水”和疯癫的关系最初被认为是一种净化关系。在社会仍然对疯癫有一定容忍度的时候,人们相信疯癫之人经过“水”的清洗,能够褪去不良色彩。对此,福柯记述了曾经流行一时的“愚人船”现象。疯人被载上“愚人船”,经过航行就像是经历了“大水”的清洗。而后,疯人走下船,来到新的地方,当地人便会接纳疯人。这是一种“净化”疯人的戏剧性仪式。福柯说,“水域给这种做法添加上它本身隐秘的价值。它不仅将人带走,而且还有另外的作用——净化”^{[6](13)}。但是,逐渐地,人们开始在共时性结构里怀疑这种关联,人们不再以清洗和净化的态度去想象“水”和疯人的关系。于是,“愚人船”的现象也消失了。由此,“它(疯癫)留驻了。没有船了,有的是医院”^{[6](35)}。

最初,在精神病医院里,“清洗”疯人的思想仍在延续。“水”和疯人在“剧本”之中仍然有紧密的联系。在“剧本”中,还有许多其他东西被当作药用治疗疯人,就是根据这种古老的清洗想象。比如,“苦药具有海水的全部涩厉特点。它通过洗蚀来达到净化目的”^{[6](156)}。于是,与海水的涩厉口感相似的东西,都会被拿来用作药物。例如服用咖啡、肥皂等,都被当作治疗疯癫的苦药疗法。尤其是肥皂,“最好是,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服用肥皂……”^{[6](157)}随着历史的演进,话语结构中有关疯人的元素继续发生变化。

在有关“水”与疯人的想象中，一些人开始相信，“水”的真正作用并不存在于它的性质中，而是存在于它的力道之中。“水”真正能对疯癫起治疗作用，主要是“水”“发生”得足够激烈。于是，“人们认为水产生作用的唯一性质是其强烈性。不可抵挡的水流可以冲刷掉造成疯癫的各种不洁之物”^{[6](163)}。由此，“水”的作用开始脱离性质而转向力道。这是里程碑式的转变。于是，用水流对疯人进行强烈的喷射，就成为“水”和疯人的主要意义联系。这取代了此前的坐浴、盆浴、泡浴的水疗思路，“淋浴法则明显地成为一种司法手段，淋浴是疯人院中的常设治安法庭所惯用的惩罚手段……”^{[6](250)}也就是说，暴力开始在精神病治疗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福柯说，当时人们认为，“这种暴力行为据说是为了实现洗礼后的再生。”^{[6](163)}不难看出，这又是另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在前文所述的诱导疯人进食的问题上，戏剧之下的暴力色彩也在逐渐加重：对于不肯进食的疯人，院长会来到他的房门口，用铁链脚镣相威胁，命令他必须把汤喝掉。于是，疯人最终将汤喝掉，不过却要“经过这几个小时的思想斗争”^{[6](249)}。在福柯语境里可以看出，在让人啼笑皆非的戏剧背后，还有历时性的权力图景。

通过以上梳理能够发现，福柯对某些权力戏剧化特征的透视具有历时性的发生学色彩，而这是超出结构主义论域的。因为结构主义方法论只存在于共时性研究之中，所以对于福柯某些历时性研究而言，我们需要考察其与其他理论传统的渊源，进而准确定位其思想史地位。由此，通过提炼其中的关键概念会发现，实践、历史、生产力、暴力，乃至阶级力量崛起等实际上更加靠近马克思所代表的理论传统。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19]。这启发我们，解放并不能仅仅依靠对共时性结构的分析来完成，更重要的是依赖阶级力量的成长，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暴力实力的增强。对此，马克思直言：“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20](861)}对于福柯描绘的近代西方的禁闭与规训等问题，马克思也相应地指出：“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

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20]846}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强制劳动的历史性记录和福柯分析实践改变话语的论述，具有很强的同构性。同时，我们如果将福柯语境中的社会权力集团编织话语牢笼的行为，和马克思语境中掌握经济基础的社会集团构筑上层建筑的行为，进行对比又能够发现：二者的论述其实异曲同工——只不过马克思的论述更宏观，而福柯更微观。

关于福柯的权力理论与马克思的权力理论间的关系，学界一直存在两种争执不下的观点。以莱姆克主编的《马克思与福柯》中所收集的十篇代表性论文为代表观点，主要强调二者间的差异：主要强调福柯的微观剖析方法和马克思的宏观归纳方法间的区别。但是，在国内学界一直有学者致力于马克思和福柯的同构性研究。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体现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诸问题与福柯权力理论的许多主题之间的互相渗透和印证”^[21]。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的权力理论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对“类型总体”和“全盘手段”的分析（“类型总体”也称作“格局”，“全盘手段”也称作封闭性之中的“关系媒介”），同时配套历史演化动力的学说来辅助分析。简而言之，马克思意在指出权力格局的演化趋势和未来走向，“权力是封闭性之中足够程度的关系优势……权力格局的更迭，伴随着社会关系建构媒介的转变”^[22]。所以，从马克思的权力分析来看，解放意味着必须解除掉总体社会关系之中的全盘性权力技术。以此逻辑，社会主义必须否定和摘除全盘性资本逻辑，也即否定掉人人、事事、物物都要把自己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全盘强制。只有这样，每个人才能在不迎合全盘权力技术的前提下，自由而全面地生存和发展。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的权力理论恰恰正是福柯权力理论的“总纲性先驱”。而福柯的诸多具体分析则正是对马克思的“权力论总纲”的细致扩展。

此外，福柯还曾表达过对马克思权力论的认

同,只不过福柯强调,要找准马克思分析的真正重点所在。福柯认为,权力的真正的重点不是在“阶级”,而是在“斗争”。“总是关注‘阶级斗争’的问题,可是对‘斗争’,却忽略了”^[17](47)]。这就是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重视权力场域中的力量对比以及由此产生的压迫和冲突是把握权力的关键。所以,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福柯在分析权力的戏剧化特征之时,关于权力斗争的这部分内容确实“溢出”了结构主义论域。而马克思所开辟的权力论传统,目前看来仍是这一部分内容最切近的理论源头。因此,“符号与权力的问题,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之内,反而会得到更有力的解释。”^[23]

五、结语

戏剧性要素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权力技术的组成部分,同时,权力又在何种情境下采取戏剧化姿态来表达,这是福柯的相关质疑。我们通过对福柯的这种解读能够看出,权力对叙事及符号的借用,在近代西方是别具特点的。同时,我们也能从福柯的语境里读到一种谨慎。那就是说,面对西方近代傲慢的权力,乌托邦思维并不可取。因为,自马克思以来,我们始终被提醒着,物质力量才是观念系统的根基。揭示出这一点,对权力研究的总问题视域及方法论的选择,均有很大启发。

从具体理论焦点上来看,解读福柯对某些权力的戏剧性特征的刻画,可以拓宽研究福柯权力论的研究路径。虽然福柯经常号称他从尼采那里获得灵感,即“福柯继承尼采的谱系学,把谱系学运用到对西方社会历史的微观分析中”^[24]。但是可以看到,对历史进程中的物质力量关系的关注,恰恰体现了马克思和福柯在权力论上的传承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福柯对某些权力戏剧化特征的分析,为其权力理论奠定了一种发生学的分析基础。

就西方的现代性演进而言,戏剧构想、符号系统等如何被确立且如何主导社会,这都不再属

于柏拉图式的纯主观建构,而是属于人类历史的实践问题。相对而言,“福柯的分析有很强的历史情境性色彩,认为主体的出现及其对权力的运转载,都是历史性的。”^[25]我们将此观点对照马克思总结的相关理论,“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26]

从现实层面来看,福柯的“疯癫考古”包含着对解放的呼吁。“疯人”的遭遇具有普遍性影射意义。在近代西方,众多不能自主选择生存话语权的欧美弱势群体,都和“疯人”是同构的。他们有可能是妇女、儿童,也可能是后殖民语境里的“他者”。但总之,如果不接受西方社会的“权力剧本”,则他们都是“疯人”。

这一深刻的理论反思,对于当下的我们而言,具有深刻的现实启发意义。在资本主义的霸权逻辑仍然弥散全球四处的今天,如何摆脱全球资本对地域个性的抹杀,如何不成为霸权话语中的“他者”,如何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书写“美美与共”的崇高性叙事,从命运共同体的维度去书写国际交往的政治美学,这都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面对“霸权剧本”时的当代要务。

参考文献:

- [1] 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 第三卷[M]. 王晓朝,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PLATO. Collected editions of Plato: vol. 3[M]. Trans. Xiaochao W.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
- [2] 阿尔都塞. 来日方长[M]. 蔡鸿宾,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ALTHUSSER L. L'avenir dure longtemps[M]. Trans. CAI Hongbi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3] 弗洛伊德. 达·芬奇的童年回忆[M]. 车文博, 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
FREUD S. Da Vinci's childhood memories[M]. Trans. Wenbo C. Beijing: Kyushu Publishing House, 2014.
- [4] OSIPOVA E D. Madness, creativity, and irrationality: The problem and its interpretation in the works of Foucault[J]. Rud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4(3): 54-63.

- [5] BOUILLLOUD J, DESLANDES G, MERCIER G. The leader as chief truth officer: The ethical responsibility of 'managing the truth' in organizat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9, 157(1): 1-13.
- [6] 福柯. 疯癫与文明[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2.
FOUCAULT M.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M]. Trans. LIU Beicheng, YANG Yuany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 [7] 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等,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2.
FOUCAULT M. *Surveiller et punir*[M]. Trans. LIU Beiche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 [8] ELDENS. Foucault and Shakespeare: Ceremony, theatre, politics[J].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7(55): 153-172.
- [9] ZHOU W, WANG W. On the arbitrariness of linguistic sign: A brief commentary on De Saussure's argument of arbitrariness[J]. *Canadian Social Science*, 2018, 14(9): 4-9.
- [10] 福柯. 词与物[M]. 莫伟民,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1.
FOUCAULT M. *Les mots et les choses*[M]. Trans. MO Weimin. Shangha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1.
- [11] 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 野性的思维[M]. 李幼蒸,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LÉVI-STRAUSS C, *La pensée sauvage*[M]. Trans. LI Youzhe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2] 让·鲍德里亚. 象征交换与死亡[M]. 车槿山,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BAUDRILLARD J.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M]. Trans. CHE Jinshan. Nanjing: Yilin Press, 2012.
- [13] OLSEN M. Structuralism, post-structuralism, neo-liberalism: Assessing Foucault's legacy[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03, 18(2): 189-202.
- [14]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things*[M]. New York: Vintage, 1994: 208.
- [15] DERIDA J. *The gift of death and literature in secret*[M]. Trans. Wills 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37.
- [16] 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谢强, 马月,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215.
FOUCAULT M. *L'archéologie du savoir*[M]. Trans. XUE Qiang, MA Yu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 [17] 福柯. 权力的眼睛[M]. 严锋,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FOUCAULT M. *Dits et écrits*[M]. Trans. YAN Fe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7.
- [18] 福柯. 性经验史[M]. 余碧平,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6-17.
FOUCAULT M.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M]. Trans. SHE Bip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16-17.
-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1.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1*[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11.
-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5*[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21] 张盾, 王雪. 福柯权力理论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J]. *社会科学战线*, 2019(11): 20-27.
ZHANG Dun, WANG Xue. Foucault's power theory and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M]. *Social Science Front*, 2019(11): 20-27.
- [22] 刘临达. 权力的四重维度——马克思的权力理论研究[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18(6): 168-173.
LIU Linda. *The Four Dimensions of Power: A Study of Marx's Theory of Power*[J]. *Studies on Marxist Theory*, 2018, 4(6): 168-173.
- [23] 刘临达. 权力符号的存在条件——象征交换理论与总体呈献理论的理解差异[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5(4): 34-40.
LIU Linda. *The existence condition of power symbol——The difference between symbolic exchange theory and general presentation theory*[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2019, 25(4): 34-40.
- [24] 邹益民. 谱系学: 尼采与福柯对主体哲学的批判[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27(2): 97-107.
ZOU Yimin. *Genealogy: Nietzsche and Foucault's criticism of subjective philosophy*[J].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 27(2): 97-107.
- [25] 刘临达. 权力主体: 在福柯和 J.巴特勒之间[J]. *世界哲学*, 2019(5): 22-30.

- LIU Linda. Power Subject: Between Foucault and Judith Butler[J]. World Philosophy, 2019(5): 22-30. 2009: 592.
-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592.

Foucault's criticism at the dimension of "drama" of western power and its theoretical tradition

LIU Linda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In the wes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ramatic" dimension of power has a long history. By describing the relevant situation of western psychiatric hospitals since modern times, Foucault reveals and criticizes the "dramatic treatment" of mental patients in hospitals, including the harm of "setting roles and scripts" at will, thus opening up a new way to understanding the form of modern western domination. The discourse analysis of Foucault's criticism contains the methodological elements of Structuralism, and its historical analysis implies its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with Marx's power theory. Interpreting Foucault's criticism at the dimension of power drama not only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links of many western modernity problems, but also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peopl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to deal with the contemporary "hegemonic script", such as how to write the sublime narrative that "goals of the self and of others can be unified" in the proces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how to write the political aesthetic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and the like.

Key Words: Foucault; the dramatic dimension of power; Structuralism; historical trends; Marx

[编辑: 游玉佩]